

## 三大浪潮、三次冲击

白 烨

与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进程相同步,当代文学也走过了三十年的历程。从新时期到新世纪的三十年文学,一个极其鲜明的特征是,它在自身的积极进取、不断转型与长足发展之中,与时代一道前行,与社会一起变革,与人民一同呼吸,在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行进的同时,既享受着改革开放的阶段性成果,又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反映着改革开放的大历史,使自身成为改革开放的历史与成果的一个重要构成。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文学,在近六十年的当代文学史中,不仅占据了时间段的半程,而且在创作成果、文学实绩、艺术品质,以及理论批评的建构、作家的队伍建设、文学的对外交流等方面,也大大超过了当代文学的其他时期,创造了属于这个时代所特有的文学的辉煌。

从大的阶段来看,三十年的文学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整个80年代的“新时期”,90年代时期,进入21世纪之后的“新世纪”。在这三个相互衔接与彼此递进的阶段里,文学都遇到了以前未曾遇到过的巨大的冲击与挑战。三个阶段分别有三次浪潮,而三次浪潮构成的三次冲击,内涵与侧重各不相同,强度与烈度又前所未有的。文学正是在直面这种浪潮、承受这种冲击和迎接这种挑战的过程之中,不断自省,锻炼自身,学习自立,并逐步获得自信和走向自强的。

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的第一个阶段,劫后复苏的文学所面对的主要是政治的危压、禁锢与羁绊,这一时期文学的所有举措与行动,都是围绕着政治性的问题而展开,因而政治的浪潮就是这一时期文学的当然的主旋律。这种政治的浪潮最先表现为人们对“四人帮”及其极左路线对文艺领域的祸害、对文艺思想的扭曲的清理与清算。文艺界在逐步解放被“四人帮”“打倒”的作家、艺术家,解冻被他们封禁的大量文艺作品之后,面对萧瑟冷寂的文坛现状,首要的工作是回到科学而全面的马克思主义、毛

泽东思想的基点,用原本的经典作家的立场与观点,来纠正“四人帮”和极左路线对经典作家文艺思想的断章取义和肆意歪曲,从一些主要的文学问题入手,进行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和思想上的正本清源。有关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有关文艺批评的标准问题,有关文艺的方向与方针问题,有关人性、人道主义问题,有关“写真实”与“现实主义”问题,等等,便是这种政治背景之下的理论批判与文艺清算的具体表现。

在文学砸碎“四人帮”的极左政治的枷锁,冲破过去极左路线设置的种种雷区与重重禁区之后,文艺界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推动下,又进而探求文学走出政治束缚之后的新的生长空间与更大的发展前景。发生于80年代中期及其后的关于“朦胧诗”的争论、关于“寻根文学”的争论、关于新时期文学“向内转”的争论,以及有关“文学主体性”问题、有关新观念与新方法的研讨等,使得文学进而拓展了观念,更新了方法,文学理论批评界在松动自己的观念、扩大自己的视野的同时,也大力促动了文学创作走出现实主义一统天下的已有格局,文学创作上的“新诗潮”、“问题报告文学”、“寻根小说”、“新潮小说”、“新写实小说”的相继登台,使得文学创作由“一元”向“多元”过渡,当代文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多样化状态。

文学与政治的纠结与冲突,构成了80年代文坛的基本矛盾与主要风景。人们在必要的矫枉过正之后,又发现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并非那么简单。文学作为社会文化生活和人们精神活动的一个领域与事业,既不能完全服从和服务于政治,也不能完全脱离与远离政治。在更多的文学家那里,政治的考量已逐步化解为诸如旨趣、责任和使命一类的因素,内化于自己的文学理想与创作实践之中,而不是一种外在的标签和外带的标识。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正确认识与不断解决,是文学在新时期最为主要的时代课题和至为重要的切实收获。

进入 90 年代之后,由于思想解放和社会改革的双向深入,社会生活真正走向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建设走向了以市场经济为重心,文学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开始由“计划”转向了“市场”。随之而来的商品经济大潮,由小到大,由弱趋强,使当代文学面临了又一次巨大冲击。文学在这一次遇到的问题具有双重性的:一是文学本身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不断移动,被无情地边缘化了;二是被边缘化了的文学必须面对“市场”谋求生存这样一个现实。这样的双重压力,使得一些文学工作者一时生了困惑,乱了方寸,有的“下海”经商,有的转行歇笔,而坚守在文学阵地的文学从业者们,也颇感压力,束手无策,一些文学期刊纷纷改头换面,以求新生。发生于 1993 年间的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看起来是文学理论批评界对文学、文化现状与问题的一次集体“会诊”,实际上是知识文人面临现状与危机的一次重新定位和自我救赎。如何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发挥文学与文学家的价值与功用,有关“人文精神”的讨论确实起到了定位与定神的作用。

在这个时期,文学创作一度也充满着迷茫,呈现出散淡、无序的状态。因为“个人化”和“私人化”写作的应运而生和大行其道,一些批评家惊呼“无主潮的文学时代”已经到来。但面对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日益市场化的现实,文学工作者必须予以应对,否则很难获得生存与发展。于是,商业化的运作与炒作随之进入文学出版领域,使得长篇小说在 90 年代出人意料地陡然崛起,长盛不衰,其产量由 80 年代的年产不足百部,上升到 90 年代中期的年均五百多部,而在 90 年代末期更达到年均千部左右。长篇小说的这种“柳暗花明又一村”,使得这一领域一度在异常丰繁中颇显芜杂,作品的数量与质量不成正比常为人诟病,但它的持续兴盛为文学开辟了市场,为作者提供了机会,使许多作者的作品有了新的出路,越来越多的作者潜心于长篇的创作。此外,因为“个人化写作”的流行,以“新生代”(60 年代人)、“70 年代人”为代表的文学新人开始在文坛崭露头角,使一度沉寂的中短篇小说重新趋热,渐成气候,并显现出了不少新的气息、新的风貌。

这一时期,文学遭遇市场,从开始的惊惧,到随后的困惑,再到后来的坦然,既说明人们对于自己置身的社会经济生活的剧烈变异有一个认识与理解的过程,也说明面对环境与氛围的剧变,文学必须学会逐步适应,并在这一过程中切实调适自身。但应当承认,由于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与泛化,及其对于文化

生活的渗透与浸淫,文学还会不断面临新的困厄与问题,因而自我调适的过程远没有完结。

文学走进 21 世纪之后的“新世纪”已整整八十年,这一时段,虽然政治的风烟已渐渐远去,经济的风潮已趋于平缓,但文坛却又迎来另一个更大的浪潮和更强的冲击,这就是由传统媒体的转向与网络媒体的新兴联袂构成的信息化与媒体化大潮的强势迫近。与前两次有所不同的是,信息与媒体的浪潮依仗它高新的电子科技手段和全新的运作与传播方式,直接地介入到文学、文化的领域,对文学和文坛构成了强劲而持续的巨大冲击。比如,它既以向大众化、娱乐化的大幅度倾斜,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市场与受众,又以自由式的写作和即时性的互动,吸引了广大青少年文学爱好者投身其中。这样的一个结果,使得在传统与主流文学格局之外,又新生出了一个网络文学(或新媒体文学),使传统文学、主流文学的地盘进一步缩小,而且还使传统文学从传播手段到文学受众都颇显老化与老套。正是由于网络写作与网络阅读的陡然崛起与飞速发展,“80 后”群体才更有平台、市场和影响,成为了文学图书市场中长盛不衰的生力军。近年来博客写作的大为勃兴和后来居上,既使更多的人可以介入文学写作与作品发表,又通过博客之间的链接与呼应,构成了一个独立于报纸、期刊、影视和广播的新的信息源和媒介场,并以自由的发布、迅疾的传播,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人们日常的社会文化生活。最近,一些网络文化公司联络网络文学网站,通过强强联合的方式,一方面组建更为强大的网络文学集团公司,一方面又以市场化的手段吸纳许多著名作家加盟和进站,这也必将对整体的文学和文坛从创作、生产到传播发生重大的影响。与这种新的文学板块的联手运作和强势扩展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传统文学、主流文坛的依然按部就班和自我感觉良好,好像一切都没有改变,一切都依旧故我。因而,这些分化与分离出来不同的文学板块之间,一直没有形成必要的良性互动,更缺少整体的照应与协调的发展,这是让人为之忧虑的。

信息与媒体的大潮虽已存在多年,但其快速变化和不断扩展的势头,仍使它风头正劲,方兴未艾。我以为,我们目下所面临的这第三次浪潮,对于文学、文坛的冲击、影响与改写,一定会大于、烈于和深于前两次浪潮。如果说,政治的浪潮、经济的浪潮,对于文学、文坛的冲击与影响,还相对比较外在的话,那么这次的新信息与新媒体的浪潮的冲击与影响,显然要更为内在。因为这种冲击与冲突,在其本质意

义上,是文化内部的冲突,是观念深层的撞击,甚至是文明形态的较量。

走过了颇不平凡的三十年,经过了三大浪潮的三次冲击,当代文学虽然不时面临困窘,当代文坛几乎烽鼓不息,前行的步履蹒跚,坎坎坷坷,但毕竟栉风沐雨,勃然奋励,经受住了风吹浪打,保持了难能的自立和应有的自尊,这无疑是让人倍感欣慰并为之自豪的。毋庸讳言,已经走过的道路很不平顺,今后的道路也不会一马平川,当代文学还会面临种种新的难题与磨难,等待着我们去面对、去认知、去解决,但当代文学已在这种艰难而有力的跋涉之中,在这种严酷而有益的锤炼与磨砺之中,获得了

不少认识问题与解决问题的基本经验,却是更为重要和难能的。比如,概而言之,艺术上的创造与求新精神已成为一种自觉的行为;观念上的更替与新变已成为普遍性的自我需求;共存与多元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坚定的政策与灵动的引导已成为文坛的基本的定势,等等。有了这些在长期而丰富的文学实践活动中获得的宝贵经验,我们就有了面对一切矛盾与问题的心态上的自信,以及临困不惧的定力与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使我们可以而且能够以积极进取的姿态和争取更大胜利的决心继续前进。

(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 文学叙事中的政治情怀

贺绍俊

“改革开放三十年”,这是今年思想文化界的一个最重要的主题词,它首先是一个政治化的主题词,其政治意识形态内涵是非常明确的。文学界普遍也在做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文章,文学界同时还提出了另一个主题词:“新时期文学三十年”。将这两个主题词并置在一起,我们就看到了中国当代文学与政治的密切关系。事实上,这三十年间,我们一直没有间断过关于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讨论,这种讨论观点纷呈,大大丰富了当代文学理论。在我看来,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毋庸置疑的,无论我们从理论上对其做何种解释,都不可能将文学与政治剥离开来。因此,在讨论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时,我更关注在实践层面二者的关系是如何呈现的。事实上,在实践层面,关于文学与政治的讨论往往成为了文学发展的重要策略。也就是说,无论是强调文学与政治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并且批评作家淡薄政治意识的观点也好,还是各种去政治化或泛政治化的观点也好,都可以看成是某种创作实践的政治表达方式。即使是那些去政治化或非政治化的观点,表面上看上去这些观点要否定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要把文学看成是一种独立的存在,但体现在创作中,其实是作家们试图在文学叙事中表达另一种政治情怀,他们不过是以去政治化或非政治化的观点为这种创作实践争取到合法化的票据。因此,我们不必在意作家或理论家们关

于去政治化或非政治化的极端言论,与其空对空地,在理论上证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构成,还不如具体研究一下创作实践中文学是如何表达政治意识和政治情怀的。

利奥塔把各类知识都称之为“叙事”,叙事的功能在于给所有的知识提供合法性。我以为,利奥塔所说的叙事合法化的过程也就是一个政治认定的过程,因此可以说,利奥塔的叙事理论揭示了政治活动的本质。文学叙事应该是我们社会的一个重要的叙事类型,任何一种文学叙事无不是在为某种政治实践提供合法性的证明,它包含着作家特定的政治情怀。利奥塔站在后现代的立场上,认为要对所有的元叙事去合法性。这其实是利奥塔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激烈的后现代政治的处理方式。顺着利奥塔的思路,其实也就意味着,所有的叙事应该都会经历一次从合法化到去合法化的过程。新时期文学三十年似乎是按着利奥塔的理论描述走过来的。我们可以从中梳理出文学叙事中的政治情怀的寄寓和演变。

改革开放可以看成是中国重新启动现代化运动的历史转折,20世纪初期的思想启蒙是为中国现代化运动铺平道路的,因此改革开放首先需要接续起启蒙运动的思想文化,就有了拨乱反正、思想解放的政治背景。新时期文学的元叙事就是在这一政治背景下逐步确立起来的,新时期文学的元叙事起到了